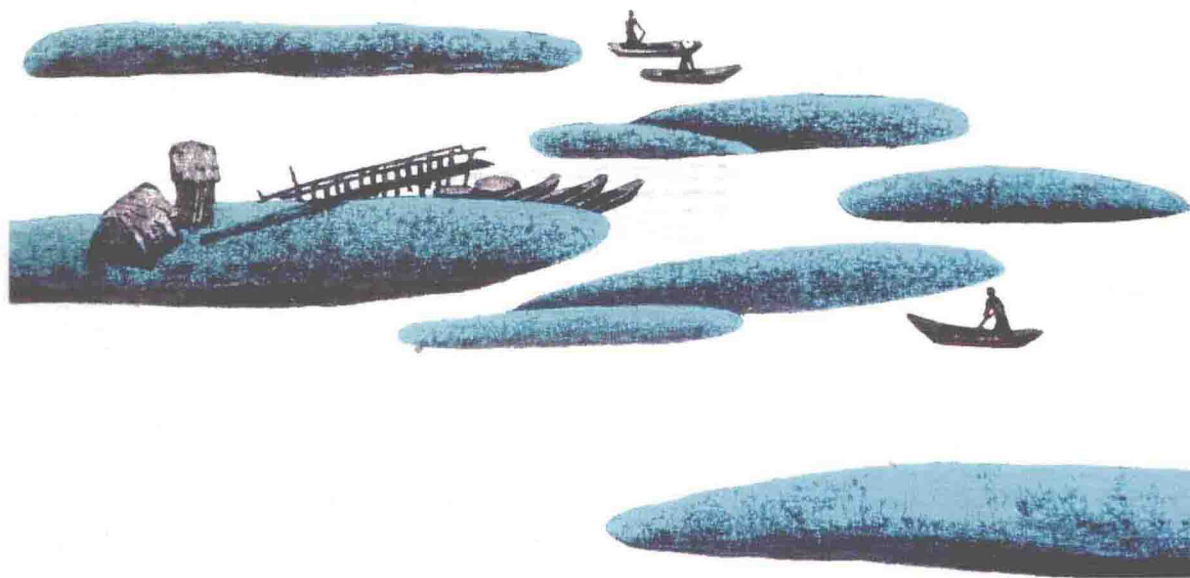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国文 著

# 中國人的教訓

( 下 册 )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 中國人的教訓

(下冊)

李國文 著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人的教训. 下册/李国文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 7  
ISBN 978-7-301-26091-3

I. ①中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59669 号

- 书 名 中国人的教训(下册)  
著作责任者 李国文 著  
策划编辑 王炜烨  
责任编辑 王炜烨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1-26091-3  
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
网 址 <http://www.pup.cn>  
电子信箱 [zpup@pup.pku.edu.cn](mailto:zpup@pup.pku.edu.cn)  
新浪微博 @北京大学出版社  
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 
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
730 毫米×1020 毫米 16 开本 23.5 印张 350 千字  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50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# 目 录

## 第五章 宋元

- 003 宋太祖的誓碑
- 016 王安石的“怪”策
- 024 苏东坡的底气
- 034 王伦的“山头”
- 041 巨贪蔡京的下场
- 048 宋徽宗的死路
- 059 李清照的生计
- 071 赵孟頫的汉奸阴影
- 078 高启死定了

## 第六章 明

- 091 任性的朱元璋
- 097 解缙的生命线
- 111 严嵩父子贪腐集团

- 120 海瑞重刑治腐
- 132 徐渭的焦虑
- 142 改革家张居正的代价
- 152 不靠谱的王世贞
- 161 对规则说不了的李贽
- 169 万历的折腾
- 176 钱谦益的失足
- 185 名士张岱的末路
- 196 傅山的人格
- 206 陈子龙的汉子精神
- 216 金圣叹破规矩
- 227 吴伟业忏悔
- 238 硬骨头张苍水
- 245 李二曲的坚守

## 第七章 清

- 257 王士禛的人气
- 268 不狂，还是洪昇吗
- 276 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嘴脸
- 288 曹雪芹拜托了
- 297 袁枚的“愉悦”生活
- 307 “和珅跌到，嘉庆吃饱”
- 316 一世风流龚自珍
- 325 慈禧躺枪
- 335 谭嗣同以死警世
- 342 王国维的气场
- 350 溥仪大婚的深处
- 360 但愿人长久（代后记）

## 第五章

宋 元





## 宋太祖的誓碑

**赵匡胤**(927—976) 宋朝开国皇帝。他依据“先南后北”的策略,完成统一大业;两次“杯酒释兵权”,解决藩镇割据的局面;贮藏钱帛布匹,以期赎回燕云十六州。

皇帝发的誓,而且是开国皇帝发的誓,对其继承者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约束力的。

九百多年前的赵匡胤,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,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;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,符合社会发展的行为。中国人好说“时势造英雄,英雄造时势”,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,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。“枪杆子出政权”,此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,但另外半句,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了,枪杆子可以出政权,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。实行文官制度,由政治家治国,而不是军事家治国,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。誓碑虽小,意义重大,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了“不杀”二字,也就给实行这种文官制度有了最起码的保障。

在此之前,中国的士人,也就是文人、读书人、知识分子,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“衙役”,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不着时甩之的“抹布”,是被当官的、有钱的、拿刀动枪的视为可以骑在头上拉屎撒尿的“臭老九”,当然更是被以秦始皇为首的暴君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整肃对象。在此之后,至少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,有一行字:“士人不可杀。”大宋王朝,第一,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;第二,但也确实有士人杀得较他朝为少的纪录。这誓碑意义非凡。

中国之文化精神,其辉煌灿烂,其博大精深,其传统悠久,其生命力蓬勃,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。视文化为民族生命,视文人为国家栋梁,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。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不是因为其国力强大,不是因为其人口众多,不是因为其地大物博,也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,而是

因为其拥有的这种文化渊源。中国,作为一个国家,败弱过,穷困过,破碎过,被人侵略得险几亡国过,但之所以得以衰而不败,败而不灭,灭而重生,生而不息,得以筚路蓝缕,走出困境,含苦茹辛,摆脱绝地,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、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。在中国,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,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,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,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喑,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、颗粒无收。但是,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,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,枯水期再长,也不会断流。

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,由昏沉蒙昧的黑夜,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。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,故而王夫之在《宋论》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:“太祖勒石,锁置殿中,使嗣君即位,入而跪读。其戒有三:一、保全柴氏子孙;二、不杀士大夫;三、不加农田之赋。呜呼!若此三者,不谓之盛德也不能。”一个受到压迫的人,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,同样,一个压迫惯了的人,要他收手不压迫人,也难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,深知文人在压迫下,难以为文,难以为人,这位遗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,才能摆脱大清王朝文网的压迫,所以,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。道理很简单,人只有一个脑袋,它可不是韭菜,割掉一茬,仍可再长一茬。因此,赵匡胤这块誓碑,基本能够约束后来的执政者,给文人带来一点安全保证。中国封建社会,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,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,舍他,无人敢做这样的承诺,而且,大宋王朝三百年,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,不杀,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,所以,他真是很了不起。

这一点,赵匡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,是无与伦比的,然而,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举,即或有,也一笔带过,或者存疑,只有王夫之以“盛德”二字,表示他衷心的赞美。

赵匡胤的这块誓碑,有论者以为,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“民主”高峰,更有论者谈及,还说明了昏君、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,不等于明主、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。秦始皇焚书,医药的书,农林的书,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。这说明,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、灭绝文化时,他作为一个中国人,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,也还在起着作用。除非他已经是畜生,是野兽,否则,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。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,得以绵延至

今,还发扬光大的原因。在中国历史上,有宋一代,对于文人比较优容,也比较信任,其人事政策的起源,是与这块在962年(建隆三年)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。

德国经济学家库恩(Dieter Kuhn)在《宋代文化史》一书中指出,中国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,首先,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,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;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。其次,宋朝在农业文明、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(如手工业)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。农业技术的新发展,新土地的开发,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,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。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,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,促进了饮食文化、茶文化、建筑和居住文化的发展。因此,库恩甚至认为,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。

美国历史学家墨菲(Rhoads Murphey)的《亚洲史》第七章“中国的黄金时代”,对于这个黄金时代有精彩的论述。

——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、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。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,“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、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”。

——在宋朝,作为中华帝国主要光荣之一的科举制度达到了它的顶峰。得到选拔的官员中,有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,“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,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,都是惊人的”。(樊树志:《国史十六讲》)

关心文学史,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,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,胜于前朝。以“唐宋八大家”为例,唐授韩愈、柳宗元的官位,也就是刺史、侍郎等职,相当于省市一级、地市一级。而欧阳修、苏轼的官位,大抵都相当于省部级,而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王安石等人,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。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“不谓之盛德也不能”了。

虽然,说到赵匡胤,都会加上“行伍出身”四字,他的御像,也是粗黑肥硕,与读书人之文雅清秀,毫不搭界。其实从他的祖辈起,历后唐、后晋、后汉,至后周数朝

的军人世家,不仅拥有殷厚的根底,还渐渐拥有门阀的褒望。从他的高祖开始,为县令者、为藩镇从事者、为刺史者、为检校司徒者,不一而足,在涿州时即为名门望户,在太原时更为世家豪族,当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时,家道不幸中落,然而大户人家的出身,贵族后裔的履历,诗书礼教的素养,传统精神的渊源,在气质上、在教养上,已非前辈那派赳赳武夫的形象。

凡读过孔孟之书、受过学塾教育、稍知斯文修养、略懂温良恭俭的中国人,对于文明的趋附、对于文化的亲和、对于文人的认同、对于方块字的敬重,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稔知熟悉的亲近感、亲切感。而那些识字不多、读书不多、思想狭隘、意识愚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,也就是那些以“大老粗”为荣的,而且还握有一定权力的人,才会抵制文明和文化,才会忌畏文人和士子,才会趁着政治运动之际,挟嫌报复,狠下死手整知识分子。因此,与文化素质缺欠的领导人,或文明修养差池的掌权者,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的,这就是庄子在《秋水篇》里所讲的:“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,笃于时也。”这就像与一个坐井观天的人,无法交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,局限于视野,偏颇于眼界,拘束于心胸,窒碍于头脑,一个正常人是可能与一窍不通的榆木疙瘩,彼此沟通,相互呼应的。

巴尔扎克有言,不经过三代的陶冶,成不了贵族。《千里送京娘》中的那个善良护送弱女子的男主角,就是赵匡胤。其正直,其正派,其正经,其正大光明,成为话本演义、弹词杂曲的正面形象。赵家虽属武将,世代从军,但宋太祖却是个异数,酷爱读书,“虽在军中,手不释卷。闻人间有奇书,不吝千金购之”。公元958年,“从世宗平淮甸,或潜上于世宗曰:‘赵某下寿州,私所载凡数车,皆重货也。’世宗遣使验之,尽发笼篋,唯书数千卷,无他物”。据《宋史》,“既长,容貌雄伟,器度豁如,识者知其非常人”。甚至为周世宗柴荣视为隐敌,对他心怀戒意。

崇文抑武,在赵匡胤前,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,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,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。甚至连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,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,武是第一位,文是第二位,这是他必然的排序,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。而赵匡胤能做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,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,从公元875年黄巢起义起,或许从公元755年“安史之乱”起的200年间频频战乱的历史经验。“陈桥兵变”当上皇帝以后,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

各地藩镇节度、相互割据、军人统领行政、胡作非为的弊端，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、兵燹成灾、中央操控不了、天下大乱的败象，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。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：“五代方镇残虐，民受其祸。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，纵皆贪浊，亦未及武臣一人也。”在他眼中，一百个文臣的贪浊，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。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来治国理政，于是，就有了这块誓碑。不得杀士大夫，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，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、发挥才干、敢于直言、恪尽厥职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、良好的环境。

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后，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，对左右的人说，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。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。唐二百多年，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；宋朝三百多年间，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。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，为此，他在选拔人才、储备人才上，采取兼收并蓄、多多益善的政策。而且直接取之民间，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方针。

宋代采取“重文抑武”的国策，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；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、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；第三，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，始终不敢掉以轻心、耿耿于怀的警惧。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，也就是“陈桥兵变”，侥幸得以成功，他不能不戒之、惧之，不能不防患于未然，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。其实“黄袍加身”的发明权，并非他的首创，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。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，甚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，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，就剑不出鞘，刀不血刃，把江山夺了。这种投入极低，产出极高，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，对那些野心不小、胃口很大、头脑简单、手握虎符的将帅，肯定极具诱惑力。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，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，如法炮制来对付他。说白了，这种兵变模式，太容易被复制了。更何况他深知唐代拥兵的藩镇，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的；五代跋扈的武将，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的，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，莫如剥夺他们的统兵之权，成为一个“光杆司令”。因此，这才有赎买政策的“杯酒释兵权”，这才有“兵不识将、将不知兵”的军事建制，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，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。这固然是后来败亡的“积贫”、“积弱”和“三冗”（‘冗官’、‘冗兵’、‘冗事’）后遗症的



>>> 宋朝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,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认真执行的。宋太祖当上皇帝后,针对当时的乱象,曾对赵普发过感慨。图为明朝刘俊《雪夜访普图轴》(现藏故宫博物院),描绘了宋太祖雪夜探访赵普的故事。

由来,但也是因经济发达、市场繁荣、文化鼎盛、科技昌明,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原因。

关于这块“士人不可杀”的誓碑,首见于宋朝叶梦得的《避暑漫抄》:

艺祖受命之三年,密镌一碑,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,谓之誓碑,用销金黄幔蔽之,门钥封闭甚严。因敕有司,自后时享(四时八节的祭祀)及新太子即位,谒庙礼毕,奏请恭读誓词。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,余皆远立。上至碑前,再拜跪瞻默诵讫,复再拜出。群臣近侍,皆不知所誓何事。自后列圣相承,皆踵故事。靖康之变,门皆洞开,人得纵观。碑高七八尺,阔四尺余,誓词三行,一云:“柴氏子孙,有罪不得加刑,纵犯谋逆,止于狱内赐尽,不得市曹刑戮,亦不得连坐支属。”一云: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。”一云:“子孙有渝此誓者,天必殛之。”后建炎间,曹勋自金回,太上寄语,祖上誓碑在太庙,恐今天子不及知云。

据《宋史·曹勋传》,已经被俘虏到金国为降人的宋徽宗,对即将南归的曹勋交代:“(太上皇)又语臣曰:‘归可奏上,艺祖有约,誓不诛大臣、言官,违者不祥。故七祖相袭,未尝辄易。每念靖康年中,诛罚为甚。今日之祸虽不在此,然要当知而戒焉。’”

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,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。第一,因系太祖所立,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;第二,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,他所立的誓碑,自然也就有钳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;第三,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、神圣仪式,以及讖语诅咒,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,是毫无疑问的。在中国、在世界,如果不是唯一,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,敢于做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,发出誓言承诺,不得杀文人、士大夫以及言事者。王夫之说:“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,终宋之世,文臣无欧刀之辟。张邦昌躬篡,而止于自裁;蔡京、贾似道陷国危亡,皆保首领于贬所。”

后来的研究者,对于赵匡胤誓碑的真实性存疑,理由有三:一是“靖康之变”发生时,《避暑漫抄》的作者叶梦得不在京城;二是未见宋朝李焘所著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与元朝脱脱所著的《宋史·太祖本记》中,有过类似记载;三是如此盛德之举,



正应借以广树恩信，延揽人心，没有必要秘而不宣，讳莫如深。这就是读书人读多了书以后的“知多识少”了，唯奉本本主义，而昧于事理常识。其实，非作者亲眼目睹的事实，不能断言其不存在；未见于信史所载，也不能说明传闻便是杜撰；至于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项德政，大肆宣传，制造舆论，只不过以今人发红头文件、开群众大会、学报纸社论、谈学习心得的行事方式，加诸前人而已，这就是书呆子的好笑了。试想一下，赵匡胤不是傻瓜，这种皇室内部的密约，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，怎能公之于众，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？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，五代以来，武人嚣张成性，能够忍受对如此“二等公民”的安排吗？而做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，得此尚方宝剑，那还了得，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吗？

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，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，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，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，并认真执行的。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仁宗·庆历三年》的范、富争论，范仲淹多次提及“祖宗以来”，大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是明白这块誓碑，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。“初，群盗剽劫淮南，将过高邮，知军晁仲约知不能御，谕富民出金帛，具牛酒，使人迎劳，且厚遗之，盗悦，径去不为暴。事闻，朝廷大怒，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，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，争于上前。”范仲淹认为：“郡县兵械，足以战守，遇贼不御，而又赂之，此法所当诛也。今高邮无兵与械……然事有可恕，戮之，恐非法意也。”仁宗“释然从之，仲约由此免死。既而，弼慢甚，谓仲淹曰：‘方今患法不举，举法而多方沮之，何以整众？’仲淹密告之：‘祖宗以来，未尝轻杀臣下，此盛德之事，奈何欲轻坏之。’”从《退斋笔录》所载元丰年间，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，蔡确和章惇也是以“祖宗以来”四字逼皇帝让步。当时，对西夏用兵失利，神宗很没面子，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，一以卸责，二以泄火，三以树威。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，却拒绝执行。他的理由是：“祖宗以来，未尝杀士人，臣等不欲自陛下始。”接下来，神宗说，不杀可以，“使刺配远恶州郡”。时为门下侍郎、参知政事的章惇，坚称不可，“如此，即不若杀之”。他认为，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，黥面对士人来说，胜于刑戮。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：“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！”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似的回答道：“快意事，做不得也好。”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，宋以前的秦、汉、唐听